

青少年读书俱乐部推荐图书

文
仲
编

1929年的故事

百年历史回眸

陕西旅游出版社



青少年读书俱乐部推荐图书

百年历史回眸

陕西旅游出版社

目 录

张学良诱杀两蛀虫	(1)
才子梁启超逝世	(5)
李子洲英勇牺牲	(8)
台湾“二·一二”抗日事件获胜	(12)
新军阀开始新混战	(14)
“奥斯卡”在美国首次颁奖	(18)
鲁迅讲演新文学	(23)
军阀挑起中东路事件	(26)
苍山为之含黛、江河为之呜咽	(29)
盛况空前的西湖博览会	(34)
北极探险	(39)
朱毛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	(41)
经济大危机席卷西方	(44)
划时代的上海艺术剧社	(49)
特务组织“CC”系	(53)

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	(55)
造成恶果的苏联“反右倾斗争”	(60)
艾伊克曼与霍普金斯	
获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65)
托马斯·曼获诺贝尔文学奖	(68)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	(71)
苏联出现个人崇拜	(77)
意义深远的古田会议	(79)
首次独立的印度国大党	(83)
西班牙独裁政府的倒台	(86)
著名小说《蟹工船》的诞生	(89)
福克纳小说的光辉成就	(91)
海明威小说的发表	(94)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创作	(95)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反调	(100)
毛泽东复信批评中央	(103)
冯玉祥入晋被囚	(103)
陈独秀成立“托陈取消派”	(104)

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 (105)

红军入闽第一仗 (110)

张学良诱杀两蛀虫

一提起张学良将军，也许连小学生也会知道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软禁了蒋介石，逼他抗日。这可以明显地表现出他的爱国热忱和卓越的政治头脑，但又会有几人知道这位 28 岁少帅背后的坎坷与挫折，奋斗与拼搏呢？身处奉系军阀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集团中，靠继承父业而跃身为军阀首领，倚老卖老的“元老”怎会听从一个刚出炉的“毛头小儿”的调遣？为了巩固自身地位，张学良毅然制造了“杨、常事件”，从而使奉系军阀不再堕落下去，自己也“稳坐泰山”，可以“高枕无忧”了。

军阀内部几乎每个人都在打自己的“如意算盘”，他们结党营私，欺压异己。奉系军阀内部也是如此。很早以来，奉系军阀内部就存在多种矛盾，有老派、新派之别，亦存洋派、土派之争。由本身利益决定，老派与洋派观点一致，对外亲日，对内好战，思想反动，属于守旧派，以张作霖、杨宇霆为总代表；新派与土派（亦称大学派），反对军阀混战，主张励精图治，发展实业，思想趋向进步，属于革新派，以郭松龄和后起的张学良为代表。随着奉系集团的崛起，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争斗亦日趋尖锐化。可以说，1925 年底郭松龄举兵反奉，是两派矛盾发展的第一次公开较量，而 1929 年初张学良诛杀杨宇霆、常荫槐，则是这种矛盾发展的结果和最后的解决。在张学良同杨、常（主要同杨）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时候，遂产生流血

事件。

就在郭松龄举起反他老爸的旗帜时，他也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尽管其父对他一再责骂，也骂不去他对郭松龄由衷的钦佩之情。他完全抛弃个人的恩怨，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处理问题，这正是他人格的闪光点，而后发生的“杨、常事件”也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的。

杨宇霆、常荫槐可谓奉系军阀内部的两大蛀虫。杨宇霆靠着巴结讨好张作霖和钻营投机的手段而深得张作霖的宠信，“倚之如左右手，甚至将个人私章交给他”。“杨宇霆也以诸葛自命，骄纵恣睢，不可一世”，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一次，在家乡法库修造祖坟时，曾发现一个石像，杨宇霆私养的马神仙等四名术士（巫神）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说这是有“九五之尊”的征兆，杨信以为真，更加滋长了野心。后还纠集了一个请愿团到北京见张作霖，要求主政东北，被拒绝。张学良“东北易帜”一事，他也要横插一腿。他一向对张学良的态度就是不予理睬，从以上的种种迹象可以看出杨有蓄意夺权之势。杨还是张作霖发动和参加军阀战争的鼓吹者和主要支持者。他一直教唆张作霖“与直系一决雌雄”，发动了两次直奉战争，但当杨为直系军阀孙传芳所驱时，他“计无所出，尽搜刮中国银行所有现款”，从南京坐压道车狼狈逃回。事后，杨为雪耻，极力怂恿张作霖再战。1926年12月，当上安国军总参议的杨为张作霖制定了进攻国民军和北伐军的军事计划，并声称一个月就能取胜，到那时，“大帅”就能被“万民拥戴，世界钦崇”。由于这一计划正中张作霖下怀，因而博

得他“拍案叫绝”。从1926年底起,在日本唆使下,蒋介石与张作霖暗中疏通。杨曾说:“蒋介石若对共产派加以彻底之压迫,则南北妥协非不可能之事”,这完全暴露了杨反人民的本质。奉系军阀的连年内战,给东北和全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据1928年4月《申报》报道,当时奉军统治下的山东,出现了“一百零八县已有四十八县无人烟,待车出关之难民达四百万人”的悲惨情景。杨对爱国将领郭松龄一向持敌视态度。郭松龄深知“杨之为人,残忍成性,阴险成性”,他对杨等人要兴兵入关的行为大怒并决心要把杨这群野心家赶出去,因此杨与郭的矛盾不可调和。后来张作霖采纳杨的建议,在日本援助下,打败了郭松龄并将郭氏夫妇就地枪杀,事后还要将郭松龄部下一网打尽,终因张学良等人从中保护,才使杨无计可施。1927年,日本有以杨代张的想法,杨便乘机与日勾结并派亲信去日本活动。杨还用欺骗的手段骗取日对他的信任。一次,日本人在《满洲日报》上搞民意测验,查看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等人的威信。杨趁机与日人联系,大量买报,并指使人填写自己的名字,然后寄给报馆,骗取荣誉。由此可以看出他卖国的丑陋嘴脸。杨还在奉系集团内寻找同党以便排斥异己。20年代初,他就想把旧派插进奉军,企图掌握军权,但无机可乘。于是,他就建立预备军,储备日本旧派的嫡系军官。此阴谋被郭松龄识破,未能实现,但他的野心是没有减小的。

在杨宇霆的同伙中,常荫槐可以算是一个极端人物。杨、常二人结成死党,“包藏祸心,事事阴谋破坏。”常荫槐

~~~~~ 1929 年的故事 ★

做事大胆、泼辣，敢作敢为，但傲气十足，目中无人，他尤其敢轻视张学良，说他“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每与张学良研究公务时，常总是“口呼汉卿，漫不为礼，且独断专行，上峰之意见尚未定，则已以己意行之。”平时，常与杨打得火热，相互支持；但对张学良，却很疏远，处处掣肘。杨要扩充兵工厂，缺乏经费，常答应可以从铁路方面给予支持；但在这之前，张学良曾要铁路拨款若干补充军费不足时，却常遭拒绝。由于杨、常二人串通一气，对张学良“事无巨细，多方阻挠，有意架空”，这就逐渐成了张学良的心腹之患。退一万步说，人的忍耐也是有极限的。当杨常两人还为“元老”身份沾沾自喜时，枪口已经对准他们的太阳穴了。

， 1929 年 1 月 10 日下午，杨、常一起来见张学良，合力要挟张在他们已经拟好的计划上签字，张对此事并不同意，要从长计议，可迫于无奈，只得推托说晚饭后再作决定，并留二人就餐。杨、常表示回去吃饭，相继辞去。之后，张学良就下定了杀这二人的决心，他找来了辽宁省警务处长高纪毅说：“杨、常两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签字，太不像话了。现在他们正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高纪毅已把一切部署完好，大约在晚八点钟，杨、常二人再次来到大帅府的老虎厅。当他们刚坐下，高纪毅等六名卫士持枪进入老虎厅，对杨、常宣布死令。杨、常闻听此言，不知所措。未等他俩开口，六名卫士已分组执行枪决。随着几声枪响，杨、

常饮弹而亡。

此举是为张学良扫除了心头之患，从此他可以在东北大展宏图，但他的内心深处是自责的，对政敌采取“杀身”的办法，是不高明的，也是绝对不应提倡的；但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他为人民，为国家除掉了两只大蛀虫，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才子梁启超逝世

丙辰义不帝秦，丁巳力主参战，内安外攘，毕竟书生能救国。

著论遍传九州，声名远腾四裔，功成身去，但开风气不为师。

这副对联出自丁传琳之手，表现梁启超一生之光辉；这是挽联一副，这是哀情一片。

1929年1月19日午后2时15分，梁启超永远地睡着了。近代中国的一颗新星陨落了。

梁启超的死有着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的原因。经历了众多有着历史重大意义的大小事件之后，投身于治学任教的任公在心理上又遭受了一连串的折磨，导致了病发及恶化。

1924年，梁夫人李蕙仙身患癌症，于9月病逝。“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夫人的长别，使梁启超情绪低落而不能自拔，不久就出现了便血的毛病。由于大意和工

作繁忙，久病不治的他终于在 1926 年同意前往医院检查，并住院配合治疗。梁启超于 3 月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医院派最好的大夫，用最先进的设备为梁查验，最后确定梁的右肾上长了一个瘤子，应立即割去。16 日手术完毕，但仍旧便血。显然这个诊断是不准确的。不过梁的精神很好，还比较乐观。出院后，用中药慢慢调养，小有成效。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 月底梁启超的四妹不幸病逝，梁启超思妹怀旧，感叹人生，情绪不稳，又开始便血。经名医治疗，稍有好转。9 月，梁启超的好友曾习经患肺癌病逝，死前之苦不可名状，梁启超亲眼所见，备受刺激，遂便血不止。可见梁启超的病情与心绪有着很大的关系。但在他此后的两年中，一系列的事情向他突然袭来，使他无力保持一种健康向上的情趣。

1927 年 3 月 8 日，梁启超激情满怀的为老师康有为的 70 大寿前来祝贺。谁知宴会上的余音未远，3 月 31 日，康有为在青岛去世。老师先已作古，使有病在身的弟子深感凄凉。然而，老师身后萧条，弟子汇去数百元，才草草入殓，这使弟子更备感悲惨。回首当年师生携手的一幕幕历史剧作，在那样的心态下，梁启超的便血病又犯了。

1927 年 6 月，王国维由于对现状的不满而投未名湖自杀。王国维和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是清华大学四大名教授。梁启超对时局的看法几乎和王国维没有区别，加上多年和王的交往，更唤起了一片哀思和愤慨。梁启超本来不平静的心情更加起伏涌动，旧病的加剧是无法改变了。

应该说,梁启超也是学术界的斗士。在他生病期间,伴随着一连串精神打击的同时,仍不放弃自己的事业。他在清华执教,不停地讲课、批改作业、接待客人、发表论文,从事先秦史的研究,发表了《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书法指导》、《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等,总计在30万字以上。直至1928年,梁启超身体状况大为不好,血压不稳,便血间有,心脏亦在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出院之后的梁启超才辞去清华的一切工作,回天津静养。但他总是静不下来,又着手编辛弃疾年谱。可惜,这年谱却成了一首未完成的交响曲,他挥写多年的笔再也扶不起来了。

11月27日,梁启超被送往协和医院抢救。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的灵魂走向了天堂。

梁启超的死可以说是心力交瘁的结果,可以说是心理打击的后果,也可以说是医疗诊断的失误。

梁启超便血多年,1926年经几个医生的诊断被认定病在左肾(应为右肾),需将左肾割去,可是在手术之日,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左肾上并没有发现肿物和任何毛病。虽然事实与推断产生了矛盾,他们还是把左肾割下。任公的病并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牙内了,因此一连拔去了七个牙,可是病还是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现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最后,病没有好,他们又说找不出原因来,这病没有什么要紧的。当时知晓这件事的很多人都很气愤,而梁启超的态度却还平和,他不

希望社会上有过多的评论和批判，因为一向反对中国固步自封的他不愿看到国人因此事而排斥西方医学。任公真的就是任公。

梁启超的一生是丰富、充实而充满了斗志和进取精神的。在“神童”的一片赞誉声中度过幼年，后来中秀才、成举人、拜师康“圣人”，从进入新潮激荡的万木草堂，到领导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从担任《时务报》主笔，到执教湖南时务学堂；站在变法的潮头，展开维新的思想路；从为宪政运动推波助澜，到与袁世凯握手合作；从《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到护国运动的主帅；从在政治漩涡中沉浮，到告别官场，漫游欧洲；从致力于文化教育，到治史求新研究佛学……这就是他短短五十六年人生的缩影。任公以他的存在给中国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中国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需长篇大论的评价，仅从他的人生经历、成果、学术影响以及逝后对各界的惊动，足以证明梁启超的人生价值。

李子洲英勇牺牲

1929 年处于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对于共产党来说，它却是个“大熔炉”，炼出了真金，扔掉了杂质。一些懦弱的人投降叛变，而且还牵连到其他革命志士，李子洲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捕的。1929 年 1 月底，陕西省委书记马云藩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了李子洲和省委其他



领导人，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2月2日深夜，李子洲和党团省委的其他负责人刘继曾、李大章等先后被捕，关进西安市西华门敌军事裁判处看守所。

敌人抓到李子洲等省委负责人后，对他们采取了种种威胁利诱手段，梦想从他们身上捞到我党的主要机密。2月3日，敌军事裁判处处长亲自审问李子洲，但一无所获，只好草草收场。回到牢房，李子洲和刘继曾分析研究面临的情况，感到可能会有叛徒出卖，决定加强对被捕党员的教育工作，密切注意狱中党员的表现，并对开始动摇的一些党员，进行耐心说服教育工作，要他们经得住考验；对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则提高警惕。在这种危险时刻，自己的生命随时会失去，李子洲考虑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党的安全，这是可贵的。几天后，敌人又审问子洲，要他供出渭华暴动中党的活动情况和党的文件藏在哪里，继而恫吓，扬言要施以毒刑。但革命者的意志力是不可摧的，敌人仍然无法从他的口中得到半点党的机密。

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看硬的不行，便来软的。约在李子洲入狱一个月后，肖振瀛，就是一开始审讯李子洲而碰了一鼻子灰的那个敌处长，他命令卫兵一律卸掉狱中政治犯的脚镣。在生活待遇上，也特别“关心”，以头等白面相待，妄图用“软化”的手段来劝李子洲屈服，这一招是敌人的惯用手法。国民党陕西省府主席宋哲元还在肖振瀛的陪同下，装出一幅“慈善”的面孔来“看望”狱中政治犯。宋哲元装模作样地说：“李先生，你好！我来看望你们了！”李子洲怒目而视，冷冷地回答了一句“谢

谢!”宋哲元又问道:“李先生,你相信什么主义呀!”李子洲昂然答道:“我相信列宁主义!”宋反问:“信仰列宁主义有什么好处?”李子洲理直气壮的回答:“列宁奉行共产主义,反对剥削和压迫。他一生为人民谋利益,丝毫不顾自己。他领导俄国革命成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宋哲元无言对答,调转话题,又以威胁的口吻问:“李先生,你怕死不怕死?”李子洲巧妙的回答说:“古人言,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嘛!”宋哲元碰了一鼻子灰,露出一副窘相,继而又说:“我如果把你释放了,你还干不干共产党的事!”李子洲坦然地回答:“你们是不会释放我的!”宋哲元束手无策,半晌儿说不出个话来。

敌人的软硬兼施全落空了,而后又采取了所谓“攻心战。”他们给狱中每个政治犯发一本《三民主义》的小册子,指定让李子洲讲解。李子洲把敌人的“教诲室”当讲坛,巧妙地同敌人进行斗争。他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赞扬孙中山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实践,讲解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挂羊头卖狗肉,镇压人民革命的罪恶勾当。过后不久,敌人看守所长又威逼所有政治犯写一份为国民党蒋介石歌功颂德的“效忠书”。李子洲团结狱中难友,坚决地顶了回去。敌人又别有用心地胁迫政治犯写详细自传。李子洲又一次予以拒绝。敌人无计可施,又重新给他带上沉重的脚镣,生活上也百般虐待,吃的净是发霉的黑面,掺着沙子腐烂了的小米,酸霉味刺鼻,难以入口。

这时已是春末夏初,牢房里阴暗潮湿,加上粪便的腥



臭，苍蝇、跳蚤、臭虫，使人终夜不得入睡。李子洲入狱前就已积劳成疾，此时胃病更加严重，随后又患伤寒，继而转发肺病，身体越发消瘦下去。狱中同志心里非常难过，多次劝他用“济难会”（狱外党救济受迫害的同志的秘密组织）的经费买些滋补药品，李子洲都婉言谢绝了。他说：目前党组织的经费非常困难，要为党的事业着想，照顾大多数同志，我的病好不了啦，不要管我！在敌人的折磨和摧残下，李子洲病已垂危，同志们便联名上书反动当局，强烈要求给李子洲卸镣。反动当局不予理睬。直到李子洲病逝前几天，敌人才派来卫兵卸镣。李子洲愤怒而坚毅地说了一声：“不用了！”

在狱中，李子洲曾通过看守兵和狱外友好人士的帮助，给在家乡的妹妹登岳写信，表示：“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李子洲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发出这铿锵有力，激动人心的言词，充分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视死如归的坦荡胸怀，和对未来充满必胜信念的崇高精神境界。

六月，天气逐渐的炎热，牢房里闷得透不过气来。李子洲的病情日益恶化，虽经友人请名医王志蔚治疗，难友们精心护理，仍不能好转。1929年6月18日，李子洲不幸病逝狱中，时年37岁。

李子洲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西北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他在西北广大人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的牺牲是中共的一大损失。为了纪念李子洲同志，

满足陕甘宁绥德分区人民的请求，陕甘宁边区政府将绥西办事处改为子洲县。1941年5月，中共绥德地委在李子洲的家乡绥德县城建立了纪念碑以告慰英魂。

台湾“二·一二”抗日事件获胜

在日本帝国主义稍将注意力转向本土，对本国革命人民进行疯狂的残酷镇压，大肆破坏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并血腥的发动“三·一五”大检举事件之际，在台湾这个宝岛上，共产党组织乘机秘密地成立了。本着提高各阶层人民的革命觉悟，团结更多的受剥削、受帝国主义迫害的民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协助各革命组织斗争活动的开展等原则，台湾共产党成立后，迅速广泛地进行活动。

“台湾青年读书会”台中市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这些共产党直接领导参与的组织，实践，虽然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重创，但通过这些实际的工作锻炼，不但年轻的台湾共产党积累了斗争经验，而且，通过日本官方的无意“宣传”，共产党公开的站在了台湾人民的面前，而它的影响，也不断地在台湾人民中扩大。为了帮助农民阶级，共产党与农民组织直接联系，创办了农村青年训练班，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讲析国际形势，阶级斗争理论，向广大农民发行《农组情报》等刊物的形式，为革命斗争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积极分子。此外，共产党又在